



中外作家谈创作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外作家谈创作

舒 聪 选编

下 册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伊斯兰的起义》序言	[英] 雪 莱	(1)
论小说	[法] 左 拉	(16)
浪漫主义	[法] 司汤达	(35)
《人间喜剧》前言	[法] 巴尔扎克	(51)
论艺术家	[法] 巴尔扎克	(72)
爱弥尔·左拉研究	[法] 莫泊桑	(91)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德] 歌 德	(110)
论小俄罗斯歌谣	[俄] 果戈理	(125)
关于形象思维	[俄] 果戈理	(135)
关于《父与子》	[俄] 屠格涅夫	(138)
谈形象思维	[俄] 屠格涅夫	(151)
论情节的典型化	[苏] 多 宾	(156)
论题材的提炼	[苏] 多 宾	(206)
生活素材和艺术情节	[苏] 多 宾	(247)
情节结构和作品思想	[苏] 多 宾	(287)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苏] 高尔基	(320)
《铁流》的创作经过	[苏] 绥拉菲摩维奇	(366)
《夏伯阳》和《叛乱》的写作经过		
	[苏] 富曼诺夫	(405)
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		
	[苏] 法捷耶夫	(416)

《伊斯兰的起义》序言

〔英〕雪 莱

现在我奉献于世人的这个诗篇，仅仅是一种尝试，我简直不敢指望获得什么成功；即使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做不好这个尝试，亦不足引为羞辱。这篇诗是对于公众思想气质的一种试验——试验那些开明而有教养的人渴望改善社会道德和政治风气的心情，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胜过那曾经摇撼我们时代的风暴。^①我设法运用了音律和谐的语言，联翩的飘逸幻想，人类情操的种种急骤而微妙的变化，运用了构成一个诗篇的一切要素，借以宣扬宽宏博大的道德，并在读者心目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善的信念和希望；这些，决不是暴力、曲解或偏见所能使其绝迹于人间的。

为此，我采用的这个故事，既从极大的普遍性方面着眼于人类情操的阐述，又复缀以种种感人的、富有浪漫气息的事件，鄙弃一切虚伪的谎言和陋规，引起每个心灵的共鸣。我并未企图用一套完整的论据去推行我的主张，以代替人类现行的主张。我只是要唤醒人们的情感，从而使读者明了真正的德行之美，并激励他们从事探讨——我就是通过这种探讨而树立了我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我对于人世间某些极其辉煌的智力的信仰。因此这首诗是叙事式的，而不是说教式的

(第一歌例外，完全是序论性质）。诗中一系列的画面展示了：热衷于美德并致力于人类爱的那样一颗心灵的成长和进展过程；它怎样促使想象、颖悟、感觉等方面极其莽撞而异乎寻常的冲动获得陶冶与净化；它对于“光天化日下人压迫人的一切现象”的忍无可忍；它想要唤醒群众的希望、启发人类和促使人类进步的意愿；实施这种意愿的迅速效果；一个庞大的民族怎样从奴役和屈辱中觉醒过来，并真正理解了道德的尊严和自由；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压迫者；揭露那些欺骗人民走上听天由命之道的宗教骗子；成功的爱国主义所具有的宁静气度；真正的博爱所具有的宽容和仁让；雇佣士兵的卑劣和野蛮；不以惩罚和憎恨、而以仁爱和怜悯对待罪恶；暴君的背信弃义；全世界统治者的联盟^②；被废黜的王朝勾结异国军队进行复辟；爱国者的惨遭屠杀和扑灭；既存政权的得胜；专制法统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内战、饥馑、瘟疫、迷信、家庭情感的完全破灭；鼓吹自由者被错判死刑；压迫者的得意一时及其最后必然崩溃的确切不移的预兆；无知和谬误的短暂，天才和美德的永恒。这就是构成我这个诗篇的一系列画面的轮廓。如果我在这个故事中着意渲染的这些高尚情操，并不能引起读者的普遍激动，对美德的热烈渴望，不能给他们引起一种与卑劣欲念不能相容的、深沉和强烈的向往之心，那也不要将这种失败归咎于这些崇高而激动人心的主题，认为它不足以引起人类的共鸣。既然诗人的灵感及其成果是由于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种种栩栩欲生的形象和感觉而构成的，那么，诗人的职责就在于：把他自己从这些形象和感觉中所得到的愉快和热诚传达于他人。

法国革命时期中过份走极端的做法^③，曾一度引起象猖

獗的瘟疫一样的恐慌，各阶级无不受其侵袭。这种恐慌后来才逐步趋于稳定。一个受了几世纪欺骗和奴役的民族，一旦他们的镣铐获得了部分的解脱，是不能象自由人那样以智慧和静穆而自持的，但人们再也不会因此就认为，人类今后应当世世代代承受这笔无知和苦难的遗产。他们当年的行为，除了粗暴和轻率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特点，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自由固然可以因此而充分推行，虚妄亦因此而缺陷毕露。人类事件中本来就具有一种急流涌退的状态^④，它往往会在暴风雨之后，把人类破碎的希望载入一个安全的港口。在我看来，今天的人们都已经熬过了一个失望的时代。

法国革命可以看作文明人的一种普遍情绪的表现，其所以造成这种情绪，乃是由于当时社会的知识水平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制度的改革或逐步废除问题。这种情绪造成了种种重大的危机，一七八八年可以看作危机肇始的年头^⑤。这事件引起了每个人的共鸣。那些最宽宏、最厚道的人，也正是那些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共鸣的人。可是那种尽善尽美的要求，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那一次革命在各方面都是无往而不胜，那么，暴政和迷信就不值得我们切齿痛恨了，不妨拿一个俘虏作譬喻：如果镣铐的毒锈还没有侵蚀到他的灵魂，那么，他只消用手指轻轻拨动一下，就可以打开这付镣铐。那一次由于许多鼓动家的粗暴和暴政的一再复辟所引起的剧变是可怕的；其影响所及，在整个文明世界里可谓无远弗届。在那种富则穷奢极侈、穷则难免饿毙的社会里，被灾难压得呻吟不已的人怎么会听取理性的呼吁呢？昨天还是一个横遭践踏的奴隶，今天就可能一下子变得心胸开阔、忍让为怀、独立不羁吗？要获致这种成果，有待于世世代代

的德智兼备之士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不渝的希望，饱经磨折而始终保持其信心的那种勇气，经过有系统的努力，来开创社会风气。这是经验所提供的教训。但是，在法兰西争取自由的进程中，希望一经遭到挫折，迫不及待的求善心情却忽略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致这种心情本身也由于意料不到的结果而一度趋于湮灭。于是许多极其热诚、极其好心、崇尚公众利益的人们，片面地看了一下他们所叹息的某些事件，便以为他们的满怀希望已遭到悲惨的破灭，因此，造成他们精神上的破产。于是意气消沉和厌世心理便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了沮丧中的安慰，而这种沮丧也唯有在不知不觉地夸大其本身失望的过程中获致解脱。影响所及，使得一代文学也受到作家们失望情绪的沾染。形而上学^⑧也好，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方面的探讨也好，简直无异于徒劳无益地企图复活某些已经被推翻的迷信，甚至沦为马尔萨斯之流^⑨的诡辩，其用意无非是为了保证人类的压迫者千秋万世的跋扈飞扬。我们的小说和诗歌中也同样笼罩着这种富有传染性的、意气消沉的阴影。可是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浑浑噩噩中觉醒过来。我似乎觉察到一种缓慢的、逐步的、无声的变化。出于这种信念的支使，我写了这个诗篇。

我不敢妄图与我们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们比高下。可是我也不愿追随任何前人的足迹。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语言风格或诗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摹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我也决不赞成仅仅在文字上别出心裁，致使读者忽略我可能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线索，却一味折磨他们去根据文学批评的原则探索我们的技巧。我只是把我的思想用极其明朗而适当的语言表现出来而

已。一个熟悉自然、熟悉人类最杰出的著作的人，在语言的取舍方面，是难得不根据直觉办事的，其实自觉本身就是熟悉了这种情况而产生的。

诗人应该受到一种特定的教育，否则他的天才和灵敏的感受力就不能发挥尽致。诚然，脑力迟钝、观察力不灵敏的人，不可能单凭教育就享有诗人的称号；脑力并不迟钝、观察力也并不失之灵敏，但是辞难达意、或是辞不达意的人，也不能单凭教育而享有诗人的称号。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后面两种人之中的某一种人，我不得而知。我希望比上述情况略胜一筹。我凑巧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这倒是有利于我这样一种抱负的。我从童年就熟悉山岭、湖泊、海洋和寂静的森林。我与“危险”结成了游伴，看它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嬉戏。我曾踏过冰封的阿尔卑斯山，曾在白朗峰之麓居住^⑧。我曾在遥远的原野里漂泊。我曾泛舟于波澜壮阔的江上，日以继夜地驶过山间的急湍，看日出、日落，看满天繁星闪现。我见过不少人烟稠密的城市，处处看到群众的情操如何昂扬，磅礴，低沉，递变。我见过暴政和战争的明目张胆、暴戾恣睢的场景；多少城市和乡村变成了零零落落的断壁废墟，赤身裸体的居民们在荒凉的门前坐以待毙。我曾与当代不少的天才人物交谈。古希腊、罗马的诗歌，现代意大利诗歌，以及我们本国的诗歌，一如外在的自然风光，对于我始终是一种热爱，一种享受。我就是从这些泉源中吸取了我的诗歌形象的养料。我曾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诗歌；我曾经读过我所能理会的诗人、历史家和形而上学者^⑨的著作，把壮丽的大地风光看作诗人应当加以体现、加以融汇贯通的各种自然元素的共同泉源。然而，我所提及的这些体

验和感受本身，并不能使人成为诗人，而只是使他们具备了作为诗人的听众的条件。至于诗歌的一个更重要的特点（也即将我自己胸中的感受引起别人共鸣的那种能力），我究竟掌握了多少，老实说，我自己也不得而知；这还得看我这首诗在读者中间产生的效果如何，我衷心盼望着读者的见教。

上面说过，我避免摹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帕里克尔斯时代的悲剧诗人^⑩是如此，意大利的古学复兴者^⑪亦复如此；乃至宗教改革以来出现于我国的那些伟大的才智之士，遂译《圣经》^⑫的许多翻译家，莎士比亚，斯宾塞，伊莎丽白王朝的许多戏剧家^⑬，培根爵士^⑭以及嗣后一段时期里的冷峻的理性论者^⑮。——所有这些人，都各因其类，有其相同之处，亦有其相异之处。由此看来，福尔德^⑯不能被看做莎士比亚的摹仿者，一如莎士比亚不能被看做福尔德的摹仿者。这两个人之间，除了受到同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共同影响之外，恐怕就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共同之处了。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里，无论是极其卑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我之所以采用了斯宾塞诗节（一种美不可言的诗节），并不是我认为它比之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的素体诗更值得作为诗歌声律的楷模，而是因为素体诗或则成功，或则失败，没有藏拙的余地。也许一个抱负不凡的人所向往的正是这一点。但是，一个受过音乐陶冶的心灵若能把这种韵律（按指

斯宾塞诗节——译者)妥加安排,使其谐和有致,则能产生雄浑绮丽的音响;我在这方面颇为醉心。然而我这个意图在若干处所完全失败了;我在这里要求读者:如果在一节诗中发现了亚历山大诗节^⑯,则把它看作我过份粗疏所造成的讹谬。

但是,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或是在任何别的问题上,我都是毫无顾忌地信笔写来。说起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幸:作家们丝毫不介意作品的永久性问题,只是斤斤较量于眼前的褒贬。写作起来总是要顾虑别人的评论。文艺批评原是产生于缺乏诗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间歇时期。诗歌,跟那种一味着眼于调节和限制诗歌之功能的艺术^⑰,二者是不能并存的。朗吉那斯^⑱不可能是荷马的同时代人,布瓦楼^⑲也不可能 是贺拉斯的同时代人。何况时下这类批评根本就提不出它自己的见解:它和真正的科学决不相同,往往不是走在人类舆论的前头,而是走在人类舆论的后头,甚而以卑劣的奉承手法,收买我们的某些最伟大的诗人^⑳,让他们把自己的想象力戴上莫须有的桎梏,当上了扼杀天才的同谋犯而不自觉——每天都在扼杀那些或是抱负比他们小、或是时运比他们差的天才。因此,我力求依照我想象中的荷马、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的写作方法去写作,完全不去理会那种匿名的责难。我深信,恶意中伤和颠倒黑白唯有引起我怜悯,决不会扰乱我平静的心境。我自会理解那些不敢吱声的、狡诈的敌人们意味深长的沉默。我将会竭力从侮蔑、漫骂和诅咒中去撷取责难者们对我的训诫,也许这些训诫有助于改正他们在我这第一篇诉诸公众的、严肃的呼吁^㉑中所发现的不足之处。如果某些批评家的眼力的敏锐能够媲美其心肠的恶毒,那么,他们的刻毒的笔墨将会使人获得多大的教益啊!其

实，我怕我是够心术不良的了，竟把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诡计和无补于事的谩骂，拿来打趣一通。倘若公众认为我这篇作品一文不值，我一定会在当年密尔顿获得不朽声誉的文坛面前低头认输^②；而且，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还要从这次失败中吸取力量，再接再厉，重新从事一件也许不会再是一文不值的思想工作^③。我不能设想，卢克莱修^④当年构思他那个诗篇时（诗中所宣示的主张，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基础，诗中感人的雄辩成了人类的奇迹），他会一边写、一边顾虑着当时那些下流的、迷信的罗马贵族所雇佣的诡辩家要对他的作品进行非难。当希腊成了俘虏^⑤、亚细亚成了罗马共和国的附庸^⑥，濒于奴役和毁灭的边缘——正是在那样一个时期里，一大群叙里亚俘虏——那荒唐的亚斯他录^⑦的盲目信徒，以及苏格拉底和芝诺^⑧的一批不肖的继承者，冒用了自由人的名义，助长着权贵的恶癖和虚荣，借此苟且偷生。这些坏蛋，善于以一套肤浅的、似是而非的诡辩，为那种鄙视美德（这种美德乃是奴隶们血肉的一部分）、妄信预兆的主张进行辩护——其实这种妄信预兆，乃是一种致人类想象力于死地的、偷天换日的做法，它起源于东方被奴役的社会，然后使西方诸国皆被卷入漩涡。难道智慧而又思想高尚的卢克莱修，竟会畏忌这种人的訾议吗？他的近代继承者——那些可以说是极其卑劣的继承者，都会不屑于以这样的条件去看待人生的。

我现在呈献在公众面前的这个诗篇，写作时间不过费了六个月工夫。在这段时间里，我以努力不懈的热诚从事于这项工作。我一面写，一面仔细而认真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定。我本当乐于让它以完美的面目问世，据说多花些工夫修

订，总可以臻于完美。可是我发觉，这种做法固然对于作品的精确性有所裨益，但同时也可能大大地耗损了从心灵涌向笔端的语言和形象方面的新颖，劲健。虽说写作只花了六个月工夫，构思过程却长达数年之久。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细心分辨，哪些是具有戏剧性特点的、用以阐明作品人物性格的思想言论，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言论。譬如说，人们对于上帝所抱的谬误而退化的概念，在诗中是受到谴责的，但被谴责的并不是上帝本身^①。出现在我诗中的一些迷信者，他们对于神的信仰，实在是玷污了神的仁慈性格，与我自己的信仰截然不同。还有，在提倡对人类精神状态进行重大改革、以促进人类社会制度方面，我决不恭维那些粗暴的、恶意的情操——这些情操时时刻刻都在伺隙混进极其有益的社会改革中来。诗中没有报复、嫉妒和偏见的容身之地。唯有爱，被当作统治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律，在诗中处处受到赞美。

(王科一译)

注 释：

①时代的风暴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

②全世界统治者的联盟应指1815年由俄、普、奥三国发起的“神圣同盟”。全欧洲除英国、土耳其和罗马教皇以外，都纷纷参加了。旨在以维护宗教为幌子，镇压拿破仑垮台以后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英国其所以不参加，不过是“坚持不让自己的手为任何义务所束缚”，实际上却在积极支持“神圣同盟”的反革命措施；土耳其不参加，只不过是因为它的国王不是基督教徒；至于罗马教皇，据他自己

宣称，他“不必形式上加入同盟”，因为他一向遵循“神圣同盟”的原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欧洲宪兵”——沙皇俄国，中心人物则为奥国宰相梅特涅。

③这里所说的“法国革命时期中过分走极端的做法”，系指雅各宾专政时期而言。雅各宾专政时期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它在1793年推翻了吉伦特的反革命统治，掌握了政权，针对着当时外国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外交、军事、教育、经济、保安等在内的革命性措施，实行了革命民主专政，打退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进攻，尤其是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余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这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体系。但是，这场革命，同其它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只是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代替了封建剥削，“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一般劳动人民仍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决定它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雪莱是一向注意钻研法国革命的，在1812年1月12日致葛德文的信中，曾提及他要写一本书，名之曰《试论法国革命何以未能造福人类》(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Benefit Mankind)，可惜未动笔。但从雪莱在这段文字里发表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论调来看，他写此诗时的见解，仍未能摆脱葛德文关于革命学说的影响，葛德文在《论政治正义》(1946年牛津第三版影印版，卷一，280页)“论革命”中曾引了赫尔惟修(Helvetius)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自己对法国革命的见解：“当时的智力的土壤还是坚硬的、无法渗透的；也许会落下雨水，湿润一下土壤的表面，但是肥沃是无望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情况。”

④关于“急流涌退”，试比较葛德文《论政治正义》第一卷第281—282页引证赫尔惟修的话：“毫无疑问，人类事务中呈现着一种起伏涨落的现象。在各种相互隶属的问题中，势必有一种风气，使得

某种真理在某个时期内较之另一种真理更受欢迎，更受注意。但是从真理的实体（the mass of truth）考虑，则至为宏大，不能容许这些变幻。自文艺复兴至今，真理始终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进展着……没有一步是后退的。数学、物理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都是通过有规则的进展，达到目前的成就的。”

⑤指1788年法国贵族的反叛，要求召开三级议会。继而发生骚动，高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各地人民，都纷起响应，与王家军队发生冲突；6月7日，格累诺布尔人民甚至从屋顶上以瓦块击王军，是为“抛瓦日”，王室被迫答应于次年5月初召开三级会议。1788年的贵族革命一般被看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⑥雪莱原注：“我应当把德鲁蒙德爵士的《若干学术问题》看作例外，这是一部十分犀利、十分有力的关于形而上学批判的著作。”按：德鲁蒙德（Sir W. Drummond）的生卒年月约为1770—1828，系英国政治家与外交家，著有若干种哲学和政治著述。《若干学术问题》（Academical Questions）出版于1805年。

⑦雪莱原著：“马尔萨斯（1766—1834）在他这部著作的最近几版中，申述了道德约束（moral restraint）对于人口原理的某种支配作用，这倒可以看作公众希望复活的一种象征。他这种让步是和他的一切妨碍人类进步的推论相适应的，同时也使得《人口论》这样一篇论著恰恰足以说明《政治正义》的不可驳斥性。”

⑧白朗峰（Mont Blanc）：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海拔15,781呎，位于法国与意大利、瑞士交界处。这里指1816年夏天诗人再度去瑞士，在日内瓦湖滨居住了三个月，雪莱的名诗《咏白朗峰》（Mont Blanc）即写于此时。据雪莱夫人《雪莱1816年诗作题记》（1917年牛津版《雪莱诗集》532页）：“雪莱越过姜慕尼山谷（Valley of Chamonix），在阿芙桥（Bridge of Arve）上久久流连，望白朗峰及其四周山岭峡谷，有感于衷，因以命篇。”

⑨雪莱原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虚构的作品中可能会有完满

性 (Perfectibility) 这种东西，尽管倡导人类进步的人们往往只把圆满性一词应用于科学。”

⑩帕里克尔斯时代的悲剧诗人，指的是艾斯契拉斯、索福克利斯和攸里庇底斯。参阅雪莱的散文《论帕里克尔斯时代》(The Age of Pericles. 载《雪莱论文书信集》，瓦特·司考特有限公司版，136页)：“介乎帕里克尔斯诞生与亚理士多德逝世之间的这一段时期，不论就其本身而言，抑就其对文明人后代命运的影响而言，毫无疑问，都是世界史上最为值得纪念的时期。当时道德条件与政治条件的结合，造成了文学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进步——这种结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那种迅速与持续的进步又何以立即受到阻拦，以致退化，——这些问题，只有留待后人去诧异和揣想了。”按：帕里克尔斯时代，通常被称为古希腊的黄金时代。

⑪意大利的古学复兴者指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学者。

⑫雪莱寝馈《圣经》，对其评论极高，把它看作古代诗歌的里程碑。第一个把《圣经》全文译成英文的是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时间约在1382年，较后的一个译本则出现在1611年，标志着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散文的高度成就。

⑬伊丽莎白王朝的戏剧家指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托诺尔·西瑞尔(Toumeur Cyril, 1575?—1626)和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1580?—1625)等。

⑭雪莱原注：“唯有密尔顿卓尔不群，照亮着整个时代。”

⑮冷峻的理性论者似指十八世纪早期启蒙主义作家。

⑯福尔德(John Ford)：生年约在1586年，卒于1639—1640年。英国剧作家，著有《情人的忧伤》(Lover's Melancholy, 1628) 和《爱的牺牲》(Love's Sacrifice, 1633)等。

⑰按英诗体例，斯宾塞诗节(Spenserian stanza)每节九行，第一行至第八行每行包括五个“抑扬格”(iambic)，第九行包括六个“抑扬格”，韵脚为ababbcbcc；亚力山大诗节(Alexanderine)每节八行，

每行包括六个“抑扬格”。雪莱这里的意思是说，若干该用五个音步的诗行里用了六个音步。

⑯限制诗歌之功能的艺术，指文艺批评。

⑰朗吉那斯 (Longinus Dionysius Casgius, 约213—273)：古希腊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或疑《论崇高》(Treatise on the Sublime)系出其手笔。

⑲布瓦楼(Nicolas Boileau-Despreaux, 1636—1711)：法国批评家及古典主义诗人，著有《诗艺》(Art Poétique)等。

⑳这里被收买的诗人应指“湖畔诗人”华滋华斯、骚塞和柯尔律治。

㉑“第一篇诉诸公众的、严肃的呼吁”即《伊斯兰的起义》。

㉒密尔顿 (1608—1674) 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诗人，其代表作《失乐园》表现撒旦对上帝的反抗，雪莱在这里以密尔顿自许，显然是针对当时反动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对他的诽谤而发的。

㉓重新从事一件思想工作，意思似说，再写一个诗篇。

㉔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公元前99—55)，卓越的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其代表作《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以诗的形式阐述了原子论唯物主义的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所提倡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卢氏所采取的是客观世界可知性的立场，主张世界上物质的多样性只不过是物质粒子即原子结合的多样性，物的消灭只是原子的分离。他批判了宗教偏见，认为“正是宗教更经常地孵育了人们罪恶的亵渎行为”(《物性论》中译本第6页，1958年三联书店版)。诗中极其着力于自然现象的精微描绘。卢氏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促进了科学的传播，并对现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影响，极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推崇。

㉕㉖希腊于公元前146年亡于罗马；叙利亚于公元前189年败于罗

马；公元前148年，马其顿变成罗马的行省。东方就这样被罗马侵吞了，东方的宗教也随之构成罗马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雪莱在这里提到的是希腊罗马哲学的第三时期，即自公元前三世纪和二世纪起，由于奴隶占有制度的总危机和崩溃，哲学渐趋没落，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退化。上句提到的向卢克莱修进行非难的诡辩家，指的是反民主的、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反动哲学家，如克里底亚和希波丹漠等。

²⁸ 亚斯他录 (Ashtaroth)：古代巴比伦人所信奉的神，东方各国亦多信奉之。相当于罗马的维娜丝或希腊的阿芙罗狄特 (Aphrodite)。亦名依稀塔尔 (Ishtar)，它的形象是一个妇女，身上有枝茎生出来，象征生命的繁殖。这本是古代东方原始农村公社时期、人们尚不能认识自然、因而神化自然、崇拜自然的一种表现，但随着最古老的奴隶社会和专制国家的出现，自然崇拜也用以反映国家和国王专制政权的存在，于是依稀塔尔的形象也随之变成了一位森严可畏的女战士，天上的女王和国王政权的保护者。古代亚述的尼尼微和伊拉克的亚贝拉都有它的神殿。参阅《旧约》《列王记（下）》第23章第13节：“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

²⁹ 芝诺 (Zeno of Elea，公元前490—436)：据《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55—56页记载，亚理士多德把芝诺称为辩证法的创立者。他曾企图推翻僭主，被拘讯，他说有要事要跟僭主附耳密谈，于是一口咬下僭主的耳朵。僭主问他是否还有别的同谋，他说：“有的，那就是你自己，你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说完这些话，他就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吐在僭主脸上。

³⁰ “……被谴责的并不是上帝本身”这句话构成了历来争论的焦点——雪莱究竟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如果是有神论者，何以在牛津大学著《无神论的必然性》而被学校开除？如果是无神论者，何以又说什么“被谴责的并不是上帝本身”？索尔特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